

# 有關廣州十三行起始年代的爭議

趙春晨\*

廣州“十三行”之名最早起始於何時？這是自上世紀以來學術界一直存在爭議的一個問題。本文對歷來有關這一問題的各種觀點及其主要依據進行了梳理，並對爭議發展的態勢、解決問題的關鍵以及未來研究的走向，提出了自己的認識與前瞻。本文認為，有關廣州十三行起始年代的懸疑，未來必須結合澳門早期通商歷史來加以探討，方能得到最終的破解。

## 20世紀60年代之前的幾種意見

有關上世紀60年代之前學術界對廣州十三行起始年代的看法，梁方仲先生曾在1960年發表的〈關於廣州十三行〉一文中作了概括與介紹。他約略歸納為三種意見，即：

第一種，“亦是最早提出的意見，就是把康熙五十九年(1720)廣州洋貨商人組織公行的這一年，認為是廣東十三行起始建立的年代。英國的摩斯、美國的亨特等西方學者主張這一說。後來梁嘉彬著《廣東十三行考》已指出此說的謬誤，認為‘是年無非為十三行商始有共同組織(公行)之一年而已’。”

第二種，“認為廣東十三行出現在公行成立之年以後，如日本學者稻葉巖古郎認為在乾隆二十五年(1760)以後，十三行逐漸變成了公行的代名詞。這一說顯然是站不住腳的。”

第三種，把廣東十三行的創立時間“定於粵海關設立的前後”，亦即康熙二十四年(1685)前後。<sup>(1)</sup>

梁方仲當時作的這個歸納，比較全面，也大致準確，但是由於祇是約略性的，尚不夠細緻。實際上，除上述三種意見外，據梁嘉彬的介紹，

早期外國學者中曾經還有接近於第一種意見、又稍有差別的康熙六十一年(1722)說。<sup>(2)</sup>而梁方仲所言第三種意見，又可細分為粵海關設立(1685)前與設立後等幾種不同觀點。

主張十三行創立於粵海關設立之前的學者，主要是梁嘉彬，另外還有吳晗、汪宗衍等人。他們之間在具體的看法上也不盡一致：梁嘉彬在所著《廣東十三行考》(1937年南京國立編譯館初版)中，論證“粵海設關之年(康熙二十四年，1685)，可確定已有十三行”，其主要依據是明末清初人屈大均的著作《廣東新語》中收入的《廣州竹枝詞》，已有“洋船爭出是官商，十字門開向兩洋，五絲八絲廣緞好，銀錢堆滿十三行”的詩句，而“此書在康熙二十六年(1687)以前已行於世，故所述廣東之事，當屬其中年之所見聞”<sup>(3)</sup>。梁嘉彬又謂，“第當時行數實不過數家，而名曰十三行者，則或誠如《粵海關志》所云‘沿明之習’耳”，“有明一代，對外貿易蓋以官設牙行為媒介；而牙行又以廣東為盛，福、泉、徽商人皆爭趨焉。萬曆以後，廣東有所謂‘三十六行’者出，代市舶提舉盤驗納稅，是為‘十三行’之權輿”<sup>(4)</sup>，可見他實際上已將十三行創立的時間上推到了明代，但苦於尚無確鑿的證據，故當時僅云“或”和“權輿”而已。吳晗在為梁嘉彬

\* 趙春晨，廣州大學十三行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兼任廣東省歷史學會副會長；廣州地方史學會會長；近期主要研究方向為嶺南文化史和廣州史。

的《廣東十三行考》寫作的書評中，依據清禮親王昭為《嘯亭雜錄》卷九〈吳留村條〉（按：吳留村即吳興祚，康熙二十一年正月起任兩廣總督）中“鄭氏既降，公又奏通商舶，立十三行，諸番商賈，粵東賴以豐庶”的記載，判斷“十三行之立，當為康熙二十一年至二十四年(1682-685)四年間事”<sup>(5)</sup>。汪宗衍則在1957年發表的〈十三行與屈大均廣州竹枝詞〉一文中，以包含有“銀錢堆滿十三行”詩句的屈大均《廣州竹枝詞》的第一首寫道“邊人帶得冷雨來，今歲梅花春始開。白頭老人不識雪，驚看白滿越王臺”，證以同治《番禺縣誌·前事略》中關於康熙二十二年(1683)冬至次年初春廣州出現歷史上罕見下雪天氣的記載，考訂《廣州竹枝詞》寫作年代為康熙二十三年(1684)的早春時節，並推斷在此之前業已有十三行存在了。<sup>(6)</sup>

主張十三行創立於粵海關設立後的學者，是彭澤益先生。他在1957年發表的〈清代廣東洋行制度的起源〉一文中，將十三行的起始時間定為康熙二十六年(1687)左右或稍後。同時他還對被梁嘉彬等人視為“十三行權輿”的明代廣東三十六行是否具有外貿牙行的性質提出質疑，認為“明代廣東香山澳的對外貿易由一般牙行商人經紀，並未另設有專門的買賣機構，而這個‘三十六行’是否是明代廣東專營對外貿易的一種商行，還是一般牙行商人的行幫統稱，還是值得研究的問題”，“明代三十六行向市舶提舉領取稅餉銀兩，提舉抽取十分之一數，或為陋規或為利息，這祇能視為封建官府以官銀發商生息的故事，而不表現為三十六行直接參與對外貿易的買賣行為”<sup>(7)</sup>，他實際上是對十三行創於明代的觀點予以了否定。

### 三十年來不同觀點的爭議

20世紀60年代之前學術界有關十三行的起始年代雖已出現多種意見，但基本屬於各說各的，彼此並無辯駁與交鋒。而且三種大類別的意見中，第一、第二兩種隨着中文史料的發現和中

國學者的研究進展，已明顯顯露舛誤而被學人所捨棄，惟餘第三種意見得以延續。但這個第三種意見，如前所述，實際又分成了好幾種不同的觀點，彼此的分野已經開始顯現。進入20世紀80年代之後，隨着中國大陸政治形勢的變化、學術思想的解放，對十三行歷史的研究迅速昇溫，並一直持續至今。有關十三行起始年代的問題成為近三十年來國內學術界關注的焦點之一，不同觀點之間展開了熱烈的交鋒。下面將基本情況分幾個方面概括之：

老一輩學者的繼續探索。一些上世紀60年代之前已經對十三行起始年代問題進行過探索的老學者，在這一時期又進一步補充、完善自己的觀點，發表論著。如梁嘉彬於抗戰勝利後渡海赴臺，在臺灣繼續孜孜不倦地進行研究，1981年他在為《中華百科全書》撰寫的“十三行”辭條中，依據早期來華葡人和西班牙傳教士的有關記載，確認明代嘉靖年間已有十三行。他寫道：“當葡萄牙人入居澳門之前，已有海道副使汪柏立‘客綱’、‘客紀’準備與葡人交易，以廣人及徽、泉等商為之的記錄，蓋因輸出貨大宗貨為茶、絲、絹布、磁器、漆器之故，不得不以徽州、泉州及廣州商人分別經紀其事，當時中國對外貿易已有集中於廣州為輸出入總口之勢。近查蕭濬華譯《天主教十六世紀在華傳教志》(……)可以看出當時已有十三家商號(行)在廣州壟斷貿易，葡人在1557年(嘉靖三十六年)入居澳門之前，已經和廣州當局及商號有廣泛的接觸了。這些商號便是後來為世所熟悉的‘廣州(廣東)十三行’。”<sup>(8)</sup>上世紀50年代曾寫作〈清代廣東洋行制度的起源〉一文的大陸學者彭澤益，則於1981年發表〈廣東十三行續探〉，進一步考證十三行是“粵海關監督設立之次年，即康熙二十五年(1686)，廣東巡撫李士禎會同兩廣總督吳興祚和海關監督宜格爾圖公議創立的。時稱洋貨行，即十三行”<sup>(9)</sup>，其依據為李士禎當年為此事招商承充行商而發佈的〈分別住行貨稅文告〉。

圍繞《廣東新語》成書年代的討論。由於屈大均的《廣東新語》一書是迄今人們所見到的提

及“十三行”一名的最早著作，所以不少學者試圖通過考訂其成書年代來推定十三行的起始。先後就此發表專門性論文的有趙立人、吳建新、南炳文等。其中趙立人的論文〈《廣東新語》的成書年代與十三行〉，通過分析屈大均書中的若干文字記述，比對相關的史實，得出結論：“《廣東新語》成書於開放海禁之前，準確地說，當在1678年或1677年下半年。因此，《廣東新語》中提及的十三行，也應出現於1678年之前。”<sup>(10)</sup>吳建新在〈《廣東新語》何年成書〉和〈《廣東新語》成書年期再探〉兩文中，列舉《廣東新語》書中的多條文字，說明該書在1678年(康熙十七年)以後仍有寫作，並對趙文“以〈新語〉未提及的重大事件作為成書斷限的依據”提出質疑，認為《新語》為筆記體，比較靈活，“對某些事件闕載也不足為奇”，而且該書“並不是成書於一時一地，而是凝聚着作者較長時期的心血與艱苦的勞動，並不能將此書的成書年代限定在很短的時期內”。他的看法是，《廣東新語》的成書年代是在康熙二十六年(1687)或在此年之後，而書中有關十三行記載的寫作年期，則不一定就是此年，應當“參酌各種記載加以分析”來確定。<sup>(11)</sup>南炳文的論文〈《廣東新語》成書時間考辨〉，依據《廣東新語》卷二八〈怪語〉中記有康熙十九年(1680)所發生事情的情況，也對該書成於康熙十七年(1678)的說法提出了異議。<sup>(12)</sup>

圍繞明代廣東三十六行性質的討論。明代廣東三十六行，被梁嘉彬在《廣東十三行考》中稱為“十三行之權輿”，其性質如何與弄清十三行之起始關係密切，因此不少學者圍繞這一問題展開了討論。吳仁安在〈明代廣東三十六行初探〉一文中，對明代廣東三十六行的命名含義、行商數額及與清初三行的關係作了探討。他結合明代海外貿易前後變化的狀況，對明萬曆年間周玄暉所著《涇林續記》裡的記載，即“廣屬香山為海舶出入嚆喉，每一舶至，常持萬金，並海外珍異諸物，多有至數萬者。先報本縣，申達藩司，令舶提舉同縣官盤驗，各有長例。而額外隱漏，所得不貲，其報官納稅者，不過十之二、三而

已。繼而三十六行領銀，提舉悉十而取一，蓋安坐而得，無簿書刑杖之勞”這段話進行分析，認為明朝萬曆年間出現的廣東三十六行，是一種由官牙轉化來的承攬對外貿易的商業團體，“他們代替市舶司長官提舉官主持海外貿易，提舉官‘悉十取一’，‘安坐’而得，故三十六行行商們也都是在官府控制下從事對外貿易的官商”。吳仁安還認為，明代廣東三十六行的命名，“祇不過是明代對‘各行各業’的一種習俗的稱謂”，是“就其成數而言”，其具體行商數目則長期“在十三家左右”，所以“到了明末時期人們乾脆把它稱為‘十三行’了”<sup>(13)</sup>。對於吳仁安的觀點，李龍潛在〈明代廣東三十六行考釋〉一文中加以詰難。他依據對明代廣東市舶司執掌、對外貿易稅收制度以及澳門中葡貿易等情況的考釋，判斷明人周玄暉在《涇林續記》裡所說的三十六行，“實際上就是三十六個手工業行業，或商業行業。其頭頭與‘攬頭’的性質一樣，在市舶提舉的包庇下，向澳門外商領銀，為他們提供他們市場所需要的手工業製品，從中攫取利潤”，“由於三十六行的活動是非法的，自然談不上是當時承攬對外貿易的一個商人行幫的總稱，也不是在官府控制下從事對外貿易的官商，更沒有替市舶提舉主持對外貿易、盤驗外國商船抽收稅課的行為，不具有牙行的性質”，自然也與十三行無關了。<sup>(14)</sup>李金明在〈明代廣東三十六行新論〉一文中則認為，周玄暉《涇林續記》中載述的明代“三十六行”，既非“牙行”，亦非“攬頭”，而是“由官方指定專營進出口貨物的三十六個舖行”，“這些舖行經營進出口貨物是由官方指定的，他們從官府那裡獲得“澳票”，隨同抽分官下澳進行交易，他們的性質同一般商人一樣，在‘重本抑末’的明代封建社會裏，不僅其社會地位低，而且經常受到官府的攤派和勒索，(……)正因為如此，故這些舖行在同外商的交易中，最多祇能起到提供出口商品、收買進口貨物的交換作用，而根本不可能‘代市舶提舉盤驗納稅’，或‘代市舶提舉主持貿易之事’，更不能同清代經營對外貿易的洋行——廣東十三行相提並論”<sup>(15)</sup>。而鄧

端本在〈廣州十三行名稱及起源考辨〉一文中，則將裴化行著、蕭濬華譯的《天主教十六世紀在華傳教志》中關於明嘉靖年間“(中葡之間)商業的利源，是被原籍屬於廣州、徽州(安徽)、泉州(福建)三處的十三家商號壟斷着。他們不顧民衆的反對，一味致力於發展外人的勢力”的記載，與周玄暉《涇林續記》關於廣東三十六行的史料相對照，推斷“十三行在嘉靖時期就已經誕生”，三十六行是十三行的延續和發展：“因當時海禁已開，民間貿易風起雲湧，廣州和澳門的對外貿易業務，都有很大的發展，所以經營對外貿易的十三家商號，便發展而為三十六家了。由於這些商號擔負起牙行所特有的經營責任，所以提舉市舶才能安坐而得，無簿書刑杖之勞。”<sup>(16)</sup>此亦可自為一說。

結合澳門早期通商史所作的探討。早在上世紀，梁嘉彬先生就認識到了研究澳門早期通商史的重要性，主張“結合澳門早期通商歷史，進一步探討十三行起源問題”<sup>(17)</sup>。近年來，國內尤其是廣東的一些學者循此路徑開展研究，頗有收穫。如章文欽的論文〈清代廣州十三行與澳門〉，其中有專目探討“十三行與澳門貿易的關係”，惜該文主要講粵海開關以後的情況，對十三行起源未作詳細論列，僅云“十三行的名稱可能起源於明代”<sup>(18)</sup>。鄧端本在〈廣州十三行名稱及起源考辨〉一文中，結合澳門早期通商歷史情況，指出屈大均〈廣州竹枝詞〉中“洋船爭出是官商，十字門開向兩洋，五絲八絲廣緞好，銀錢堆滿十三行”詩句寫的是澳門情況，“當時開洋的地方是在十字門，這十字門也就是澳門”。他進而斷定：“清初澳門貿易是按照明朝的制度，在通商期間，必有牙行在主其事，而牙行在成立時，亦沿明之習，命曰十三行。再加上貿易額不斷的增長，所以才有‘銀錢堆滿十三行’的吟詠。”<sup>(19)</sup>趙立人更連續發表了〈明代至清初的十三行與十字門海上貿易——以屈大均1662年澳門之行爲中心〉、〈再論明清之際的十三行與澳門貿易〉、〈廣州古代海外貿易若干問題探索〉、〈明清之際的廣州外貿經營者——十三行與攬頭〉等多篇論文，通過梳理有關澳門早期通商情況的中外史

料，並與梁廷枏《粵海關志》、屈大均〈廣州竹枝詞〉和《廣東新語》中一些有關記載相互印證，考定提及十三行的屈大均〈廣州竹枝詞〉“所記爲他1662年赴澳門時所見”，認爲“既然屈大均在海禁初期(清代海禁始於1656年)已見到了十三行的貿易活動，則十三行的出現必然更早。綜合屈(按：屈大均)、梁(按：梁廷枏)、裴(按：裴化行)三家之記，則十三行始於明代，殆爲事實”<sup>(20)</sup>。趙立人還提出，屈大均《廣東新語》和明代不少史料中所講到的在廣州澳門間經營外貿之“攬頭”，實際就是十三行商人，“唯‘攬頭’所指爲商人，‘十三行’所指爲商號”。“從明代至清初海禁解除之前，十三行商人亦被稱爲‘攬頭’。攬頭來往於廣州澳門之間，不但直接與外商交易，而且跟隨政府官員參與對外交涉，並對外商的行爲負責。當外商有違法行爲時，攬頭即使沒有過錯，仍要負上連帶責任而被治罪。可見這一時期攬頭在中外貿易和中外交涉中的作用，與清代設立海關後的十三行商人完全相同。唯一的不同，是貿易口岸的改變。開放海禁前，攬頭與外商的交易地點是澳門，開放海禁後，‘攬頭’之稱不復見於文獻，而十三行商人與外商的交易地點轉移到了廣州黃埔”。<sup>(21)</sup>這一見解頗具啓發性，若能進一步考實，將是十三行起源研究的一個突破。

### 幾點粗淺認識與前瞻

通過梳理近百年來學術界對廣州十三行起始年代的研究與爭議，筆者提出以下幾點粗淺的認識，並試對今後的研究方向作一前瞻。

一、廣州十三行的起始年代，從最初一些外國學者提出康熙五十九年(1720)或乾隆二十五年(1760)以後，到近年越來越多的學者主張或採信明嘉靖年間(1522-1566)的說法，已將十三行起始時間上推了兩個世紀左右。這表明近百年來學術界的研究工作取得了不小的進步，研究的時間與空間已經大為擴展，研究的內容也大為豐富了。時至今日，人們以往習慣稱呼的“清代廣州十三

行”，已經面臨是否應當改稱為“明清廣州十三行”才更加名副其實的問題了。

二、儘管對於廣州十三行起始年代的研究已經取得不小的進步，但問題並沒有完全解決，爭議仍然存在。即以近年流行的廣州十三行起源於明嘉靖年間的主張為例，其所依據的重要史料——裴化行著、蕭濬華譯《天主教十六世紀在華傳教志》中關於明嘉靖年間“(中葡之間)商業的利源，是被原籍屬於廣州、徽州(安徽)、泉州(福建)三處的十三家商號壟斷著”的記載，固然在商號數目上與“十三行”相合，卻並沒有直呼其為“十三行”，而且裴化行的書雖已說明是以16世紀來華傳教士信劄和記錄為依據，卻並未具體註明上面那段記載的出處<sup>(22)</sup>，故而尚不能將其作為鐵證。而明代其它文獻中，迄今也還沒有發現“十三行”之稱謂。所以，問題仍有討論的餘地和求證的必要。

三、近年來學術界在廣州十三行起始年代的研究上所取得的進展，證明梁嘉彬先生提出的結合澳門早期通商歷史來探討十三行起源的主張十分正確。今後若想在此一問題研究上取得更大的進展，非在這方面下力氣不可。尤其是關於澳門早期通商歷史的不少外文原始資料，目前還分散收藏於西方一些國家的檔案館、博物館或圖書館裏，許多未被發掘、整理和刊佈，已經刊出者也大多未譯成中文，這是一個很大的資料寶藏，需要我們去深入挖掘，相信資料上的新發現必將有助於廣州十三行起源問題的完全破解。

四、學術界對廣州十三行起始年代的研究與爭議持續了百年時間，這本身就表明了此一問題的重要性，它是研究十三行不可回避的一個問題。但與確定起始年代相比較，弄清楚十三行這種外貿組織與制度的起源過程、性質及特點，則顯然更為重要。在以往研究廣州十三行起始年代的論著中，不少學者實際也是把名稱起始與制度起源聯繫起來加以考察的，但由於側重點多放在考訂年代上，對十三行制度、組織的起源探討得不夠。20世紀80年代就有學者提出，研究十三行的起源，“主要應該瞭解這種性質的外貿組織在何時產生”，而不是“考證‘十三行’的稱號在

何時出現”<sup>(23)</sup>。這個意見有一定的正確性。今後我們的研究應當更加自覺地在十三行制度、組織的起源上多下功夫，當然這同繼續研究十三行名稱的起始也並不矛盾，兩者反而是可以相互促進的。

#### 【註】

- (1) 廣州市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廣州文史資料》第1輯，1960年11月。
- (2) (3) (4) 梁嘉彬：《廣東十三行考》，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頁14；頁48、71；頁33。
- (5) 吳晗：〈評梁嘉彬著《廣東十三行考》〉，原載《中國社會經濟史集刊》第六卷第一期(1939年6月)，轉引自梁嘉彬《廣東十三行考》附錄，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 (6) 汪宗衍：〈十三行與屈大均廣州竹枝詞〉，《歷史研究》1957年第6期。
- (7) 彭澤益：〈清代廣東洋行制度的起源〉，《歷史研究》1957年第1期。
- (8) 中國文化大學中華學術院主編：《中華百科全書》第1冊，頁38-39，臺北1981年版。轉引自梁承業、章文欽：〈《廣東十三行考》跋〉，見《廣東十三行考》頁385，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 (9) 彭澤益：〈廣東十三行續探〉，《歷史研究》1981年第4期。
- (10) 趙立人：〈《廣東新語》的成書年代與十三行〉，《廣東社會科學》1989年第1期。
- (11) 吳建新：〈《廣東新語》何年成書〉，《廣州史志》1986年第5期；〈《廣東新語》成書年再探〉，《廣東社會科學》，1989年第3期。
- (12) 南炳文：〈《廣東新語》成書時間考辨〉，《西南大學學報》2007年第6期。
- (13) 吳仁安：〈明代廣東三十六行初探〉，《學術研究》1982年第二期。
- (14) 李龍潛：〈明代廣東三十六行考釋〉，《中國史研究》1982年第3期。
- (15) 李金明：〈明代廣東三十六行新論〉，《學術研究》1988年第3期。
- (16) 鄧端本：〈廣州十三行名稱及起源考辨〉，載甄人、饒展雄主編《廣州史志研究》，廣州出版社1993年版。
- (17) 梁承業、章文欽：〈《廣東十三行考》跋〉，《廣東十三行考》頁385，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 (18) 章文欽：〈清代廣州十三行與澳門〉，《澳門雜誌》第9期，1999年4月。
- (19) 鄧端本：〈廣州十三行名稱及起源考辨〉，載甄人、饒展雄主編《廣州史志研究》，廣州出版社1993年版。
- (20) 趙立人：〈廣州古代海外貿易若干問題探索〉，載王曉玲主編《歌德堡號與廣州海上絲路》，中國評論學術出版社2008年版。
- (21) 趙立人：〈明清之際的廣州外貿經營者——十三行與攬頭〉，載何大進主編《近代廣州城市與社會》，天津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
- (22) 裴化行著、蕭濬華譯：《天主教十六世紀在華傳教志》，頁95，商務印書館1936年版。
- (23) 袁鍾仁：〈關於廣州史幾個問題的質疑〉，《開放時代》1986年第4期。